
誰革命？
革誰的命？

范文瀾著

新華書店發行

目次

誰革命？革誰的命？.....	范文瀾（一〇）
斥所謂中國文化的統一性.....	范文瀾（一一—一三）



3 1762 9537 0

MG
D693-09
329

革命？革命？革命？



蔣介石先生作了一本「中國之命運」，聞已通令全國各黨政軍機關團體並提出批評意見，我讀完書以後，頗有所感，不敢緘默，略述所懷。

一、應該學些革命建國的基本知識

「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那是最危險不過的事情。企圖「決定」中國的命運，首先應該學香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至少應該從「新民主主義論」學得幾條基本原理解，才不致騎太大的亂子；如果有人以為目空一切，硬想對中國的命運也來一個「獨裁」，那末準備自己這人帶馬滾到深池裏去！

從「新民主主義論」至少該學些什麼基本原理解呢？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已經進入民主主義革命時代。滿清政府不懂得這個道理，誓死反抗潮流，保持封建專制，結果被主張民權共和國的同盟會推倒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及一九一七年的俄國十月革命以後，中國已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中國革命成爲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堅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國民黨，怕懂得或存心忘記這個道理，誓死反抗潮流，積極輸入「維新主義」法西斯主義及所謂「固有文化」的封建專制主義，結果大背國情，民怨沸騰，暴日乘機侵入，造成中華民族空前的危機。

革命？革命的命？

誰革命？革命的命？

國民黨反共派聽着！現在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呀！

現在的中國在淪陷區是屠殺場社會，在非淪陷區是屠殺場抗日民主根據地外，基本上也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社會；而不論在淪陷區與非淪陷區，都是半封建關係佔優勢的社會，這就是現時中國社會的性質，這就是現時中國的國情。針對着這樣的國情，中國共產黨首先掀起了並堅持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它是抗日的又是幾個革命階級民主聯合的。在今日誰能領導大眾驅逐日本帝國主義，並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中國資產階級如能盡此責任，那是誰也不能不佩服它的；而如果不能，這個責任主要的就不得不落在無產階級的肩上了。

國民黨反動派聽着！誰能領導抗日並實施民主政治，誰就是人民的救星呀！

統治階級和平地半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就是我們革命的對象，我們需要實際的崩潰。這種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政治、經濟與舊文化形態；而我們要建立起來的，則是與此相反的東西，乃是中華民族的新政治、新經濟與新文化。

國民黨反動派聽着！閉關鎖國着着什麼是革命的對象啊！

中國無產階級、農民階級、知識份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他們必然要成爲中華民主共和國的主導階級與政權構成的基本部份。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共和國。

國民黨反動派聽着！決定中國命運的廣大人民，是要建立這樣的一個民主共和國呀！

蔣介石先生既說要決定中國命運，而且也知道「破壞國家，就是破壞你本身以及你世世代代長久」的生命，這個關係太大了！那末就聽着「忠言逆耳良藥苦口」的格言，平心靜氣聽一聽「新民主主義論」，免得「著作」一部「禍國殃民」最後結果非至害人自害不可的「理論廣訓」出來。千萬別，覺醒吧！正在反對人民的內戰。



二、國民黨的革命性

中國廣大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基本勢力，而工人農民又是基本勢力的骨幹，沒有他們就沒有革命，也就沒有中國。所謂「中國的命運完全寄托於中國「國民黨」」，所謂「沒有中國國民黨，那就沒有了中國」，真有那麼一回事麼？誰都知道，政黨祇有領導的作用，它們領導的階級及其聯系的羣衆才是真實力量之所在。試看國民黨領導了那些階級和羣衆？

國民黨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政黨，佔黨內絕對統治地位的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它的「廣大」可「靠」的羣衆是軍閥、官僚、政客、土霸、劣紳、閒人、文丐、投機商人、托匪、特務、漢奸、法西斯份子、落後的受教區的教員和學生等等，一部份進步的有正義感的黨員被壓迫，甚至被監視，早戒爲黨內的萬公等。它只是「一定時期」一定程度上有些革命性，而妥協性與反革命性却佔了極大的比重。三四年前，大資產階級的「部份」以汪精衛爲代表，率領大批國民黨要人及「廣大」羣衆投奔日寇，在南京開張新店，翻印了一個「國民黨」，一個「國民政府」，一個「領袖」，担任敵後方「剿共」的「大敵」，恰恰說明了這種從反共發展到叛國的「國民黨」，「那就沒有了中國」；反之，有了從反共發展到內戰的國民黨，其去「沒有了中國」也說不盡，是竟反共是亡國的道路，理極明顯。現在還在抗戰的國民黨，在反共抗人民一點上，也以顧克齋「天職」，積極進行全黨轉勢化的工作，特務漢奸與汪說「國民黨」交流合作，情尚一家。在近時漢奸吳開先乘機「逃」歸祖國，大受歡迎；漢奸陶希聖「苦書立說」，變成「思想界」的泰斗；漢奸龐炳勳、孫殿英等三十三個高級將領前後率部投誠，不受懲處，反蒙關誦獎飾，七月二十三日中央社還宣傳：「副總司令」被俘前數分鐘，慷慨含悲向部屬說：「要以國家民族爲重，應奉以前精神，繼續奮鬥。以降敵反共而繼續奮鬥」，大區國家民族的險了！

誰革命？革誰的命？

望事實已使全國人民感到國民黨敵我混淆，面目模糊，形跡盡爲可疑！在最近中央社公開廣播「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的反動要求，並撤黃河防軍，集合精銳十六師，企圖閃擊邊區，完成「統一」，更使全國人民驚駭呼號，切齒怒目，絕對反對亡國滅種、大背民意的反共內戰。按照「國民」（不包括反革命份子，不包括漢奸）的原則，則以「國民」爲號的國民黨，似乎有考慮名義的必要。

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欽佩的，他的三民主義曾經三變：有同盟會時代以排滿爲主題的三民主義；有中華革命黨時代收起民族主義的三民主義；有國民黨改組至大革命時代接受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兩大基本任務、聯俄容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而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認爲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上，共產黨政綱與三民主義基本上有相同的部份，就是指的這個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自從一九二七年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背叛大革命以來，新三民主義久已高高掛起，無人問津。在逆精衛於鼻另鑿賣國三民主義，替日寇服務，而新專制主義的三民主義，則藉暴力推行於國內。蔣介石先生竟敢藉三民主義之名，公然說出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樣荒謬的鬼話，來侮辱人民。保皇黨巨魁梁啟超還知道改裝門面，來一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新花樣，還妄自稱「三民主義」者，却提倡愚民政策，肆無忌憚，其思想比梁啟超更倒退一個歷史時代。要把這種變質冒牌的三民主義作爲「國家的靈魂」，實在是對國家大不敬。幸而中國廣大革命民衆並無如此醜惡的「靈魂」，因之，還能保存國格，堅持抗戰，列在四大強國之一。如果外國人譏笑我們是「劣等民族，落後國家」，應由我們變質冒牌的三民主義者去承受這個侮辱。

在如此國民黨、如此三民主義的統治之下，軍事訓練兵宗旨側重反共，所謂軍紀軍令不施於降敵叛軍，却亂施於忠勇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黨務則收買大批特務漢奸，當作黨的靈魂，陰風慘慘，專以破壞革命、屠殺青年爲能事；政治則貪風大熾，敲骨剝髓，人民逃死無路，民變到處發生；經濟則農村普遍破產，百業凋零，全國經濟命脈斷絕，在少數金融巨頭之手（其中主要巨頭是蔣介石）；教

曾則賊賊青年，威脅利誘，驅迫變態特務訓練，冀奸思想，充當反共的鷹犬。這樣做下去，抗日的中國能否存在已成疑問，有何顏吹噓「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的成績亦已經昭著於國民的面前」？更有顏吹噓「中國國民黨是國家的動脈，而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動脈裏面的新血輪」？如果國民黨不趕緊反共的宗旨，不改變「革命等於反共」的謬見，即使黨和團擴張到異常大，無非增編幾千幾萬個特務大隊，禍國殃民造更大的孽！中國何辜，人民何辜，要供養這一隊反動蠱虫來加深自己的災害！「權利」「義務」那一套話頭，本意就在勸人民反共，真正國民是拒絕這種所謂「權利」「義務」的，止有喪失國民資格「國民」，才會享反共的「權利」，盡反共的「義務」。

現在驚惶徬徨，抗日、民主與革命，反共內戰、專制獨裁是反革命，測定國民黨的革命性究有多少，止要看它作出來的是些什麼事情。

三、誰是真正革命建國者

中國革命建國的基本勢力，也就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基本勢力，決不依靠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供養的鷹犬們，而是依靠工人、農民以及小資產階級。抗戰六週年來已經證明這個證實了這個真理，而中國共產黨正是領導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來完成革命建國，決定中國命運的偉大政黨。

中國共產黨一次又一次的從危殆中挽救並昭示全國人民，從抗戰中建設新中國的實例，試舉幾件人所共知的大事，足够證明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抗戰建國的事業上起了什麼作用和處在什麼地位。九一八事變以後，「攘外必先安內」，已「安」得格外起勁，中國共產黨發表「八一宣言」，呼籲團結救亡，倡導了民族抗戰的先聲。中國統治者有其一貫的歷史傳統，故意造成離心離德「一盤散沙」的局面，以便從中操縱，即大呼「一個黨」的國民黨本身，也不過是幾十個、幾百個黨的一個聯合形式而已。

誰革命？誰不革命？

？即使有所謂「國」者存在，仍不外殖民地半封建的國，而所謂「建國」，無非這一個在鐵精衛武的奴化國或一個百年來老牌的半奴化國。那時候自然會有本土身軀出殤取計對來，但所謂十年實業計劃，已「命定」了東置高閣。

所以這就很顯然，止有共產黨已經奮鬥的團結抗戰、民主建設，才是革命建國的正確道路，也止有共產黨才是領導真正革命建國的偉大政黨。企圖以反共反人民當作革命，以空談當作建國的野心家，當心「被人民拋棄，變為向隅而泣的可憐虫」。

四、請問究竟想革誰的命？

抗戰已進入第七年了，竟還有人不認識革命的對象，拿着屠刀想革革命人民之命這，理由是「中國從前的命運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國的帝國主義之手，而今後的命運，則全在內政」，就是操在我們中國國民自己的掌上」。這裏所謂「今後」，當然指本年一月十一日（中英中美簽定新約日）以後而言，如此說來，一月十一日以前，操持中國命運的是一般帝國主義，把近年來英美對華的友好援助與「寇的暴力侵略，等量齊觀，毫無區別，甚至借中英中美簽定新約作口實，宣傳中國已得完全解放，而平日寇佔中國大部份領土，連同「從前」滬甯停戰協定、何梅協定、塘沽協定等等賣國「外交」一律掛在英美外交賬上，隨新約的簽定，一筆勾銷，從此中國外交大勝利，萬事大吉祥，可以「全在內政」了。我們會學習過「特別字典」，「革命」的意義就是反共，「內政」就是反共內戰，從前中國還有「外交」的束縛，所以「安內」不够淋漓痛快，「今後」中國完全獨立自由，「內政」大有可為，時哉！時哉！機不可失！「操在中國國民的掌上」，這是騙人的話，其意是說操在中國獨裁者蔣介石掌上。

誰革命？革誰的命？

從這個荒謬思想出發，產生另一個荒謬思想，就是「中國命運其決定即在此抗戰時期，而不出於這二年之中。」這等於對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講：「二年，抗戰時期內」，企圖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

這也算是先禮後兵「政治家」的「寬大」態度吧！指桑罵槐的大叫：「那還能算是中國的一個國民，更如何說得上是「政黨」，世界上那一個國家的政黨，有從事武力和割據的方式來妨礙他本國的國家統一，而阻礙他政治？這樣還不是反革命？還不是革命的障礙？這樣革命的障礙，如果不自動的放棄和撤銷，怎樣能不禍國殃民？而且最後結果，非至害人自害不可。」……「那就找不出有什麼合理的解決方法了！」罵得好痛快，大概肝火衝昏大腦了吧？其實挨罵的那個「政黨」，何必遠到「世界上」去找呢，只要不是健忘，甚至連本國的歷史也忘了的話，同盟會推翻滿清、國民黨反對北洋軍閥，不就是這樣的政黨嗎？贖了這一大串訓斥，好像重逢西太后、宣統皇上、袁大皇上、段總理、吳上將軍之流的「盛世」，恭讀解散國民黨、討伐孫中山的嚴諭。然而滿口詛咒革命的勢力與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滿清政府、北洋軍閥、日寇汪逆都會說找不出什麼合理解決的方法和甘心在反革命的殒降上拚扎拚命，結果呢？失敗滅亡！

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偉大政黨，他和中國人民是血肉一體，他和中華民族是利害一致的，他不怕任何反革命的威脅，也不怕任何反革命的詭策，如果有誰拿出所謂「合理方法」以外的「方法」來，人民就會把他踢得粉碎，如果拿出「封建割據」、「變相軍閥」、「障礙革命」、「破壞統一」、「妨礙建設」等等缺乏政治常識的濫言來，人民就會對之以鼻。

請問國民黨反動派到底是奉誰的命？想革中國人民之命？想革中華民族之命？如果不是，為什麼成心發動內戰，難道要使中國全部淪陷才快意嗎？難道十年內戰還不够慘苦嗎？

五、幾個忠告

組織一個龐大無比的特務黨，幻想在全國實行一個新專制主義，發動內戰，二年中「消滅」共產黨及一切進步的勢力和地區，這種「朕即國家」的荒謬思想，應該放棄，因為現在是處於反法西斯主義戰爭和新民主主義的時代。

「軍政時期就不能終結」，「憲政無法開始，訓政亦無法推行」，這一類反革命話頭，應該收起，因為人民早已拜讀過「五五憲法」，也親受過保甲訓政，並不再存些什麼幻想了。軍政還是「終結」，何必要人民厭苦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豈不應了「佳兵不祥」的定論麼？

「……須知這並不是中國國民黨有什麼特殊的力量，而乃是時代與歷史的使命所造成的」，這種「我生不，有命在天」的落後思想，應該放棄。須知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歷史使命決不會落到寡頭獨裁方面，殷鑑不遠，滿清和北洋軍閥可以借鑑。

總之，凡是中國人萬萬不可存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思想，從這種思想發生的言論，一定引起日本法西斯通訊機關同盟社發出這樣的聲明：「蔣介石所著『中國之命運』一書，其論述之方向，那是沒有錯誤的，但由日本人觀之，它只是重復了已為帝國聲明說盡了的大東亞新秩序論，迎合大亞細亞主義，抄襲汪精衛之和平建國之見。『天乎冤哉！一個堂堂中國國民黨總裁，抗日六年的領袖，反法西斯同盟四大強國的領袖之一，所著的一本自認爲『革命』到了頂點的書，却被我們的敵人譽爲『方向沒有錯誤』，方向不過是『重復帝國聲明』與『抄襲汪精衛』，即使作者不害羞，國民黨人不知恥，中國人民是不能憐憫日本帝國主義這種侮辱！中國人民有責任糾正自己隊伍中個別人們與個別集團的思想。」

誰革命？革誰的命？

離革命？革誰的命？

一〇

錯誤及行動錯誤，徹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共產黨人告訴日本帝國主義者：我們的「方向」就是打倒你們，解放我們的民族，同時也解放日本人民，糾正我們民族中的一切錯誤污穢，同時糾正日本帝國主義的「方向」。中日兩國同時解放萬歲！

斥所謂中國文化的統一性

范文瀾

重慶中央社新近發表一篇社論，題爲中國文化的統一性，篇中列舉中國史實來證明中國文化的統一性。我也是喜歡談中國文化和歷史的，讀了這篇文章很有些大惑不解，願意提供些意見，向文化界的先進求教。

在沒有進入篇中具體問題的討論以前，我覺得有簡單地提出四個一般概念的必要：

第一、毛澤東同志在「新民主主義論」第三節「中國的歷史特點」裏面說：「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於一定社會的政治經濟；而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這是我們對文化與政治經濟的關係及政治與經濟的關係的基本觀點。」這當然不僅是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基本觀點，而是凡屬把握科學方法去研究文化歷史等問題的所有人們一致公認的基本觀點。我們應該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就是科學方法是消除一切成見意氣、探求真理的最公正的保證。

第二、歷史是不斷運動的，不斷變化的，不斷革新的，不斷發展的，無論何時它總包含着某種東西在產生着和發展着，某種東西在敗壞着和腐朽着兩個方面。文化，「當做觀念形態的文化」，也是歷史的一部份，所以它也包含着新鮮的發展的和腐朽的衰亡的兩個方面；新鮮的發展的文化是符合於或接近於人民大眾的意志的，腐朽的衰亡的文化是發生於或保存於沒落倒退者羣裏面的；因之我們對前者必需加以發揚光大，對於後者必需加以批評否定。

斥所謂中國文化的統一性

第三、不論古代史近代史，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任何人不得也不能憑臆牽附，要求客觀的歷史迎合自己主觀的志願；如果這樣做，關於古代史最起碼的「網鑑易知錄」就會不答應。近代史對於所謂、所見的範圍，更是昭昭在人耳目，一點含糊不得。

第四、王船山先生於明亡後，痛切的垂戒道：「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以仁義之云云」？今天正是抗日戰爭進入第七年相持最艱苦的階段，在文化問題上的緊急任務，是如何發揚民族氣節、鼓勵民族道德，如何團結全國各黨各派各階層進行民主政治，如何挽救私慾橫流、罔識大義者們的將死或已死之心，如何痛斥日寇、汪精衛及一切不肖之徒的謊言謬論，陰謀詭計。捨此而談中國文化，我們必須警惕船山的遺訓！

研究討論中國文化，首先要弄清楚上述四點，這才不會籠統地談傳統繼承。喜愛光明者決不繼承黑暗的傳統；黑暗的傳統也決不能阻遏光明傳統的存在和發展；涇渭異流，可以省却不少無謂的爭論。

下面照六朝人論辯體，專就「中國文化的統一性」提出異議；凡稱論曰：「……」都是中央社社論原文，凡稱辯曰：「……」都是我的意見。

論曰：我們要以傳統繼承者自居，必須首先看清楚一個最重要的事實，這個事實就是中國只有促成政治統一的文化，沒有助長封建割據的文化。這個事實就是證明中國文化的統一性。

辯曰：文化既指出它的統一性，更必需着重地指出它的鬥爭性，同時必須指出它的進步性正義性，或倒退性反動性；談統一更必需區別革命性正義性的統一，或倒退性反動性的統一。如果祇談統一性，又祇談抽象的空洞的統一性，那是非常危險的。例如日本法西斯強盜狂吠其所謂「日滿華一體論」和「次東亞共榮論」，「法西斯文化」，漢奸汪精衛高叫其所謂「中國反共和平統一論」，「漢奸奴隸文化」，他們也都用所謂「中國祇有促成政治統一的文化」做口實來欺騙人民。我們要不發揚正義的進步

內文之如他們鬥爭，緊決消滅他們反動腐朽的血腥下賤的文化，那末就會發生誰統一誰和如何統一的嚴重問題。在今天的中國，離開了鬥爭性和革命性來談統一性，不是中國對日寇在逆妥協的「統一」，就是日寇在逆征服中國的「統一」，除此以外，還有什麼統一的途徑？因為沒有弄清楚這個問題，所以中央社這篇文章往後就發生了一聯串的糊塗概念。

論曰：中唐以後，二百年的思想界統一運動，造成了宋以後一千年的統一國家，……遍讀古今思想家的作品，從沒有一個替封建割據作辯護的。

辯曰：蒙古滿清在當時不是異民族暴力征服漢民族的朝代嗎？孫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講演中明明白白說過：「中國幾千年以來，受過政治力的壓迫以至於完全亡國已有兩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孫先生說是亡國，這篇社論的作者却說是「統一」，難道亡國就是「統一」麼？元清統治中國三百餘年，漢民族會不斷起義反抗以破壞那兩個「統一國家」為神聖天職；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即會以理論與行動堅決反對清末保皇黨擁護當時「統一國家」的漢奸路線，國民黨是同盟會的後身，理應發揚這一光榮的革命傳統，不意國民黨的代表宣傳機關却公開歌頌元清的統一，並歸功於「中唐以後二百年的思想界統一運動」！韓愈、歐陽、程灝、朱熹之流提倡君主專制的奴隸文化是事實，奴隸文化在異族侵略下極易轉變為漢奸文化，也是事實；論者任命於號稱民主共和之世，弄筆於民族危急存亡之秋，對於這樣的專制文化漢奸文化不加以嚴厲的撻伐，反而備予表彰，頌為典範，實屬不可思議之至！若然，留夢炎、呂文煥、趙孟頫、范文程、洪承疇、吳三桂、李光地以及無數大小漢奸，都是贊助統一的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的繼承者。而文天祥、張世傑、陸秀夫、鄭思肖、史可法、黃道周、鄭成功、黃宗鑑、王夫之、顧炎武、洪秀全、孫中山以及無數忠臣義士，都是反對統一的「封建割據」者和破壞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的罪人！會國濬賣身滿清，破壞孫中山先生所再三贊美的太平革命，屠殺極慘，號稱「會剿頭」，為今日一切大小漢奸開其先路！抗戰以來的汪精衛賣身日寇，俱

言反共，破壞民族革命，窮兇極惡，無所不爲，凡屬國民，莫不切齒痛恨，爭欲食其肉而寢其皮，
 論者說來難道他們也是贊成統一的文化優秀傳統的承繼者麼？照論者說來，中國人好像是歷來對於不
 論什麼統治者的「統一」都是無條件擁護的，這就是所謂中國文化的最大特徵，那就必然得出這樣的
 結論：凡建軍據地以反抗元清或其他反動統一者都是政治的「封建割據」；凡著書立說以反抗元清或
 其他反動統一者都是文化的「封建割據」；那末孫中山先生在辛亥以前，屢謀廣東作革命根據地（按
 滿清政府說是割據造反）以反抗統一的滿清政府，在北伐以前，屢取廣東作革命根據地（照北京軍閥
 政府說是割據作亂），以反抗統一的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之流的軍閥政府，也應該作爲政治的「
 封建割據」，而孫中山先生一切鼓吹革命反抗的遺教也應該作爲文化的「封建割據」了！論者自稱「
 遍讀古今思想家的作品」，事實說明不特宋明兩朝忠臣遺老的「作品」未曾翻閱，即三民主義唯一經
 典的中山遺著似乎也未曾寓目！所謂「遍讀」豈其然乎？！

自然，依常理而論，中山遺著，論者定是讀過的；文天祥「正氣歌」，史可法「答多爾袞書」，
 黃宗羲「原君」「原臣」一類早已編入中學課本的名篇，論者一定亦是讀過的。所以似乎未曾讀過的
 原因，大概由於對「封建」「統一」「割據」「革命根據地」等詞義不甚了解，因此在這裏解釋一下
 大概還是有益的，所謂「封建」，從政治上說，就是少數地主階級專制的政治，一個國家在一個封建
 獨裁者（皇帝或不是皇帝，都一樣）統治着的時候，叫做「封建統一」，同時有兩個或幾個專制獨裁
 者據地爭雄叫做「封建割據」。歷史上有過進步的封建統一，也有過進步的封建割據。中央社社論說
 「中國的統一國家，「論規模則首推漢唐，論復興則必稱宋明」，而劉邦、李世民、趙匡胤、朱元璋
 ，恰恰毫無例外地都是由割據開國的（劉與李氏父子據陝西，趙據中原，朱據南京），趙與宋還是篡
 了其他割據者的位，劉李與朱又都是從直接破壞秦、隋、元三個「統一國家」發展起來的；但是這些
 「破壞統一」的割據，都有很大的進步的意義，這大概是這篇社論的作者也不能不承認的。他如民族

要麼歸成功割據台灣以反抗清的「統一」，至今婦孺都知道加以崇敬，類此的事例，更是不可勝數。但早現代的中國處在民主時代，所需要的是民主的政治，也需要有民主的根據地爲其準備與根據。無論如何，無論是封建統一或封建割據都是反動的，在現代的中國，特別有一個值得注意的規律，任何企圖以反民主的法西斯化的封建專制或半封建專制來實行締造統一的人，無論他暫時怎樣擁有中央的政權軍權財權，彷彿不可一世，其封建統一的結果，都不免流於封建割據，都不免因受到全國人民的反抗而敗亡。袁世凱、段祺瑞、吳佩孚的統治，在沒有遇到武力反抗時是封建的統一，在遇到孫中山、蔡松坡和國共合作、廣州革命政權反抗以後，就成爲封建的割據了。今天的世界既是民主的反抗建反獨裁的世界，即令再有袁世凱式的統一出現，在全世界範圍來說，也不過是一種封建割據；而且中國已經加入民主陣營，中國人民經過長期的民主鬥爭，也明白認識民主的必要，這種反民主的政變就全無統一全國的可能。站在反對封建統一、封建割據或法西斯侵略的革命運動方面，當其統治力量限於一地區時，這個地區稱爲革命根據地，擴大及於全國時，則稱爲革命的民主的統一。過去孫中山先生根據廣東以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北京軍閥政府的封建割據，與今天共產黨創立陝甘寧邊區及蘇北等中各根據地以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及溥儀、汪精衛等漢奸羣的賣國封建割據，都是最好的例證。

論曰：還在二千五百年前，中國思想界就起了「大一統」的運動，春秋的思想中心就是大一統。荀子就力主「天下定於一」，荀子就主張「統一天下」。

辯曰：孔、孟、荀在當時主張統一，確是一種進步的思想；他們這一思想的進步性，不在於能統籌主張統一，而在於主張應該用什麼標準什麼力量什麼方法來統一。今文家說春秋講大一統，同時講撥亂圖功。孔子作易革卦之象辭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孟子對齊宣王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行仁政至天下，勸齊宣王梁惠王學湯武的故事。荀子看到秦的經濟比較進步

，政治比較嚴明（滅六國後，却一變而為多行暴政，所以二世而亡於農民起義之手），不主張周的統一，而預料秦可以統一。孔、孟、荀都是封建學說的創造者，中心思想不外乎如何保持並擴大君主的權利；不過他們懂得政治的是非和歷史的趨勢，不敢無視人民的公意，尤其是孟子還主張「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可見他所說的「定於一」，乃是定於民，而非定於君。這比後世腐儒文巧一味提倡專制獨裁、盲目忠君，如漢奸周佛海未投敵前所宣傳的「信仰主體要信仰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服從到盲從的地步」，其智愚相差是不能比較的。

論曰：中國文化之特點，就在於充滿了融和的力量，充滿了統一的性能；由於這豐富的融和力與統一性，使中華民族能建國於亞洲大陸，有五千年悠久的歷史，如對於中國文化所集積的統一性，與由此統一性而發揮的融和力熟視無睹，縱然讚歎中國文化的優秀，也就等於買椟還珠。

辯曰：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文化高出於四鄰任何種族，但當中國統治階級遭到外來的北方游牧部落種族如五胡、拓跋、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滿洲等族的入侵，這些異族憑藉武力征服中國的中部或一部，這些種族裏面的統治階層利用中國文化的黑暗而豢養大批文武漢奸維持自己的地位。這樣雖然他們有意識地保存「騎射國語」，力戒被同化於「漢兒柔靡之風」，但歷時既久，這個外來種族一方面生產方法前進了，文化程度提高了，另一方面固有的強建樸野之俗也就因中國舊統治階層腐化影響而消滅殆盡，逐漸「融和」在漢族裏面，「只有元順帝回到長城以外，恢復了蒙古舊俗」；這一個所謂「融和」，對於整個侵入民族誠然產生了進步的結果，但對於當時國它家破受盡「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式的殘殺蹂躪的漢民族却是極可恥極可悲的。今天漢滿蒙各民族的廣大覺悟羣衆以「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精神，共同團結在偉大的抗日鬥爭中，絲毫沒有種族的偏見與歷史的成見；不適當時在「一方侵入，一方被侵入」的那個恐怖時期，被侵入的民族中的忠義之士，決沒有如今之論者所說對歡迎侵入，並以便將來用文化同化他們那樣令人肉麻的「大量」和「遠見」！

所謂「融和」，既然並不是什麼預定的計劃，而只是一種無可如何的結果，那麼，所謂融和的力量，究竟是文化還是武力，所謂融和的方法，究竟是同化還是征服？這樣的問題對於被侵入的民族說，根本不能成立。自然，從侵入者看來，問題是很明顯的，武力正從後來融和的動力，征服正是後來融和的方法；而在被侵入的漢民族中，有些人自己已不願認輸，便說是「融和的動力是文化，不是武力」。（因為武力抵抗，在失敗的投降者手裏失去了），「融和的方法是同化，不是征服」（因為自己已被征服了）。這樣說若只為聊以快意，雖然阿Q的醜態可掬，也還罷了，但是論者一定要大聲疾呼，說是「中國文化之優秀」就在於此，對此不加以「讚歎」，就等於「實積遺珠」，却不免很有些「魚目混珠」的嫌疑。照論者說來，亡了國不但等於不亡，而且還是「充滿了融和的力量」，「充滿了統一的性能」的中國文化的大勝利！那麼，文天祥等人固不必說，即如岳飛的抗戰，也是多此一舉！南宋甚至北宋對於遼、金、元也就都是論者所謂「封建割據」，只有秦檜、張邦昌或者「外來」的石敬瑭一流人才是中國文化的先知先覺了！論者在鴉片戰爭百年後、抗日戰爭六年後的今天，還來重彈這種不抵抗主義的舊調，以所謂「融和性」掩蓋「統一性」，「統一性」被「統一性」，說不知其心何居！假如日寇據此提出要求道：「讓我日本來與你們融和統一吧！這是你們貴國歷史上文化上最重要的事實，請你們連積遺珠一起賣給我吧！」試問論者能不能像薄儀、汪精衛那樣查照老例，准予出賣呢？

如果在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統治階級一味吹噓自己的所謂「融和性」，「統一性」，已足使中國一亡再亡，那麼，到了鴉片戰爭以後，中外的形勢與以前更是完全不同了，外國侵略者的生產力高過於中國（中國已經不能再像從前那樣亡了國還去賣融和「人家」，而只能被人家所「隔和」了，這時中國和中國文化的問題更不是什麼「融和性」，「統一性」的問題，而是老老實實、實實求是地推翻封建專制，發動人民力量，學習外來科學，實行內部改革，藉以救亡圖存的問題了！不懂得或不願認輸這

「點」，會造成近百年史無數次的大失敗。當初，滿清統治者是不懂得這個道理，龐然大物，提出「天朝至上」的口號，企圖用封建文化與資本主義文化對抗，結果慘遭失敗，國權殘破；後來是懂得了而不願意承認，因為承認了，就得讓位給人民；於是滿清的忠實走狗張之洞又苦心發明一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口號，它的實質就是保存固有的專制政治，拒絕新興的民主革命，而歡迎舶來的「奇技淫巧」與堅甲利兵，用以提高自己的享受和保護自己的統治，堅甲利兵而不與民主革命相結合，當然就只能「安內」不足「攘外」的，所以這個口號顯然最適合於半封建半殖民地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這個口號在今天還可以偷運舶來的法西斯主義彼此沆瀣一氣，賤長固有的專制主義，不過，憲法思想的先生們要注意：法西斯已經是一隻死在俄國，無法逃命的惡虎，全世界正義人士正到處打還擊惡虎，冒冒然拿虎皮披在自己的身上，一鳴斷不足以驚人，一動更是驢腳畢露，柳宗元「三戒」之一的那篇文章，是值得深思之的！這個口號又可以用以為投降外國的法西斯侵略者的理論基礎，例如日寇在淪陷區宣講「孔孟王道」，汪逆可以說「這是中學為體呵」！日寇在淪陷區開闢道路，擄取人力物資，汪逆可以說「這是西學為用呵」！假如不幸淪陷區與日寇竟這樣「融和」起來，則論者又將奈何哉！！

落後的文化，不能抵抗進步的文化，全人類歷史進程已經完全證明了這個真理。任何主觀願望或巧妙口號都不能改變它。試讀中國近代史，大清皇帝的君主專制，在文化上是落後的，孫中山先生的共和民權，在文化上是進步的。當時反動士大夫替君主專制遍貼「國產至上」的商標，說這才能「為體」，替共和民權遍貼「舶來至下」的商標，說這決不能「為體」；結果，辛亥革命證明了人民大眾歡迎的是共和民權。北京軍閥政府的龜孔鑽經，武力統一，在文化上是落後的，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三大政策，在文化上是進步的。當時反動士大夫又替尊孔鑽經、武力統一遍貼「國產至上」的商標，又說這才能「為體」，替三民主義、三大政策遍貼「舶來至下」的商標，又說這決不能「為體」。

。結果，大革命證明了人民大眾歡迎的是三民主義、三大政策！這種例證，舉不勝舉，實際這部人類歷史（中國史自然不能例外）無非是前進文化戰勝倒退文化的紀錄。由此可知，文化的興替，關鍵在於進化程度的高低，在於是否適合於人民大眾的需要；高者適者，一定通過各個民族而發展，低者不適者，一定相形見拙而趨于衰亡。斤斤於「國產」「舶來」的上下，舌敝唇焦，目昏齒豁，徒自苦其！甚無謂也！

論曰：在割據分立時期，往往有利用外來文化以爲粉飾的事情，即如佛教傳入中國以後，黃河流域的封建割據勢力如石勒如姚萇都會特別提倡，以維繫人民的心理於一時，然而當時中國思想界便發生了反對的運動，首先是「夷夏論」，力持中國民族的思想，其運動之有力，終使佛教改向於中國化。中國畢竟沒有因緣佛教而產生割據戰爭；隋唐以後，佛教便在統一的中央政府之下求生存，等到鞏固的改革運動勃興，佛教從此避免它對於政府的衝突，佛教大部不敢與中國的舊有文化起來對抗，中國式的佛教便與印度大異其趣了。

辯曰：這一段議論，不知根據中國何種史書，姑就普通人習見的晉書、南北史、北魏書、舊唐書、新唐書、高僧傳、法苑珠林、玄奘法師傳、開元釋教錄等書來說，都找不出這段議論的根源何在。五胡亂華是異族侵入中國北部，不得籠統稱爲封建割據。五胡酋長，出身野蠻民族，確有迷信宗教者，石勒、姚萇適逢名僧佛圖澄、鳩摩羅什這兩位大師的產生，並非他們「特別提倡」的結果，且北朝還有兩次滅佛興道的事，而「當時中國思想界」中心所在的晉、宋、齊、梁的統治者與士大夫，對於佛教之「都會特別提倡以維繫人民的心理於一時」，却尤非「黃河流域」所及，梁武帝甚至論孔子、老子都是佛的學生，他又屢設「普渡衆生」的渡苦齋無遮會，並且三度出巡同泰寺，讓人民每次出錢百萬贖身，不知這樣的常識，何以這篇社論的作者也不知道！中國統治階級這種利用宗教的愚民政策，由來已久，歷代相沿，至今仍有標榜「外來」宗教，宣傳耶和華聖經，拜給班禪做弟子或辦「時輪

金剛法會」之類，「以維繫人民的心理於一時」的把戲。佛教，從科學的唯物論的見地，是可以批評，應該批評的。但是這自然不能望之於當時的統治階級和反動的士大夫。在當時的反對者方面，有一位梁朝の范縝，他的「神滅論」乃是一篇很有科學價值的文章，可惜這篇社論竟沒有表揚這樣的科學作品，反而拉了一個南齊の道士顧歡所作「夷夏論」來「力持中國民族的思想」。「夷夏論」在學術上的地位，比佛教の經典，更要低得不可計量，裏面只有造謠謾罵，如說佛教禮拜是狐狗狗腿，剃髮是受咒刑，不娶妻是絕惡種等等，其無知，無恥與無聊，惟今日於法西斯派的反共產傳家可比擬！且在顧歡之前，即已有東晉道士王海作「老子化胡經」，顧作亦並非「首先」。「夷夏論」既是這樣下流的东西，所以不但後世未有人荒唐到用爲「中國思想界」的代表，在當時所遭僧俗各方面的嚴厲抨擊（請看張弘集），顧歡理屈辭窮，無話可講；它在南方既絕無作用，在北方更毫無影響；所謂「其運動之有力，終使佛教改向於中國化」，不知何所指而云然！南北朝淪亡，由於漢族士大夫腐朽到極點，異族乘機侵奪中原，並非因漢族與五胡對佛教有什麼爭執的意見。南朝盛行小乘教義，北朝盛行大乘教義，各信所宗，互不相犯。達摩見梁武帝談禪，不能契合，北至嵩山，面壁九年，北方並無一人借達摩與兵攻梁。佛教の生存，在分立時代、統一時代，並無區別，如隋滅陳，隋煬帝向天台智者大師卑禮求教誦，智者大師未嘗向隋中央政府搖尾求生存；所謂「隋唐以後，佛教便在統一的中央政府之下求生存」，不知如何說法？禪宗自慧能以後，宗分南北派別，流行傳播獨盛，所謂禪宗改革運動是否指慧能而言？慧能以前，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慧能以後，唐武宗前後共三次信道滅佛，他們與佛教衝突，佛教求避免而不得，曾有一次敢主動的對於政府衝突？三帝以外，佛教在禪宗發達以前，發達以後，備受帝王士大夫的尊敬布施，更何曾有一次表示對於政府衝突的意思？韓愈號召闢佛老，北宋以來，儒者照例要鬧一番，以表示「吾儒」的門面，實則暗中剽掠佛老精氣性命的教義，附會儒書（主要是「大學」「中庸」），造成所謂「道學」「理學」「宋學」等名稱的儒學。照學術史看來

，佛敎受儒學影響極小，而宋明儒學却受佛老影響極大；與兩漢南北朝儒學大異其趣了。

論曰：願爲中國文化優秀傳統的繼承者，則首先必須正視三個真實的具體的事實：一、中國的文化從來只有促成中國的統一，而決計沒有助長割據的專橫。二、中國文化的發揚光大，都在於政治統一、中國的時期，如秦漢，如隋唐，如宋明，絕無例外。三、外來文化有時縱爲割據分立者所利用，例如宗教，但不久即融會於中國固有文化之中，而喪失了它的本來面目，所以中國從來沒有宗教戰爭一類的文化戰爭。

辯曰：（一）講統一性而不講鬥爭性，又不區別統一性的正義性進步性與反動性倒退性，必致錯誤到爲統一而抹煞了異族入侵中國，結果，生靈塗炭，淪爲敵人牛馬的事實，必致誤認賣國求榮爲虎作倀的漢奸爲文化優良傳統的繼承者，必致誤認反抗的力量爲封建割據破壞文化優秀傳統之罪人，必致不敢正視和繼承孫中山先生擁護東以實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偉大事實；而孫中山先生的這偉大事業在當時就會經被那些主張「武力統一」的軍閥百端詭譎，妄指爲「作亂造反」。蔣介石先生民國十五年八月十六日的「國民革命軍出師宣言」中嚴討吳佩孚就指斥過這種詭譎說：「其尤不可恕者，則利用國人之窺制傳統思想，希圖復古，反抗潮流，造謠赤禍，以防民衆；托偶像以樹威權，藉名教以濟奸詐；欲造成一家天下，遂標榜武力統一，使一般時代落伍之朽儒官僚軍人政客結合而成封建末期滯陽式的殘餘腐敗勢力，以爲反動思想之中心。」當此日本法西斯強盜攻掠中國，扶助汪逆爲政權的統一，號稱我中央政府爲「重慶地方政權」的時候，希望中國談文化的作者們留意及之，幸甚！

（二）政治統一也要分清進步的統一與反動的統一。在中國歷史上的反動統一時代，文人學士們或作文以歌頌天子之神聖，或講哲學以鞏固君長之威權，不外提倡專制，壓抑民主，等汗牛充棟，「發揚光大」的主要部分，如此而已。秦始皇焚書坑儒；武帝罷黜百家，獨尊今文經說；隋唐以詩賦取士；宋以詩賦經義四六取士；元尊喇嘛教，相傳八超九儒十丐，斯文掃地；明清以八股取士；變皇

說書人思想，使作代聖賢立言的鸚鵡；凡此所謂政治統一時代的政府，變遷文化，如此易與，可謂「絕無例外」；至所謂分立時代，也要看這所謂分立是反動統治者的內部分立，還是進步與反動的分立，在後一種分立時期，則文化不但不會衰落，而且一定發揚光大，例如孔子創立儒宗，是在春秋分立時代，戰國諸子百家，稱爲古代文化的黃金時代，即如孟荀兩大宗師也都是戰國時人。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等大思想家，著書立說，都在反抗滿清所謂統一時期。尤顯著的是孫中山先生反滿清反北洋軍閥的三民主義思想，在中國文化史上發一大光彩；豈是依靠滿清和軍閥「政治統一」的威脅利誘收買營養，才捏造出來？要之，國家在反動倒退的政治統一之下，文化必然趨於衰落，而卑劣的舊傳統的文化，却得到特別發達，在反抗這般反動政治的運動時期，進步的文化，才可以與之俱興，直到革命統一以後，進步性文化才能正常地普遍地在全國範圍內發展起來。

(三) 中國全部歷史並無利用佛教進行割據分立之例，所謂未知何據。外來宗教，古有佛教回教，鴉片戰爭以後，天主教、耶穌教傳播亦漸盛。古代佛回二教外，其他外來宗教不發達，佛教義類已盡，至於戒潔高僧，到今天並沒有喪失了它的本來面目。回教信徒，更是極大多數遵守天方穆聖的遺訓，發規素嚴，絲毫不苟；天主教耶穌教流傳已一百年，不爲不久，中國著名人物受洗入教成爲基督教徒者，不乏其人，他們是否已經「喪失了它的本來面目」？論者說中國從來沒有宗教戰爭一類的文化戰爭，其實一部中國歷史，尤其是近百年，從文化方面說，就是一部文化戰爭史。在中國的政治戰爭史、文化戰爭史中，宗教戰爭的成分確是比較少些（絕對純粹的宗教戰爭在世界史上本來是沒有的），但如滿清政府屢次屠殺回民族，不是民族壓迫兼宗教性的戰爭麼？漢奸會國藩反對太平天國以及薩和燾之役，不是也帶着一部份宗教戰爭的色彩麼？不過論者在這裏的本意原不在研究什麼宗教戰爭，而在於否認文化戰爭，我們應該正告論者，這種企圖不但違背着中國歷史的事實，也違背着中國革命與抗戰的利益。論不知道鴉片戰爭以來的無數次反侵略戰爭沒有一次不是中國革命民族主權文化

向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文化和漢奸投降文化的戰爭？誰不知道孫中山先生提倡合乎世界潮流的自由思想民權政治，滿清政府懸賞購頭，企圖消滅中山先生的肉體生命？袁世凱獨一本「國黨孫文」，企圖消滅中山先生的政治生命？而反滿戰爭，反北洋軍閥戰爭，不也就是三民主義文化對那些頑固舊文化的戰爭？

在今天的中國，我們的全部力量都應該團結起來反對日本法西斯主義和汪逆精衛的所謂反共和平主義的文化，我們的抗戰是政治的戰爭，也是文化的戰爭——對野蠻與奴役的戰爭，這更是為中國有心人莫不首肯的！論者一定要抹煞這些戰爭的文化性質，說這些戰爭都不是為文化而戰，究竟什麼人才歡迎這種理論，不是很明顯的麼？

最後我對「中國文化的統一性」的作者謹致沉痛的和誠懇的希望，就是希望彼此都能在反日越反漢奸的立場上來討論中國文化問題和中國歷史問題，只要我們都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堅決戰士，一定不會忘了王船山先生「今族類之不能自固，而何仁義之云云」的遺訓！

定價壹元